

## 胡瓶来自丝绸之路

□周小丽

唐诗是我国文学宝库里的璀璨明珠,除了是诗歌艺术的巅峰外,还记录了当时大量的生活场景,也记录了当时使用的各种器具。比如杜甫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王昌龄的“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唐代国力强盛,通过丝绸之路使中西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这件凤首壶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中西酒文化交流的产物。

1996年曲阳县涧磁村五代墓出土了30余件定窑白釉瓷器,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文中定窑白釉凤首壶,现藏于河北博物馆。凤首壶整个器具器形高大,造型别致,是这一时期瓷器中屈指可数的艺术珍品。凤首壶以凤首作盖,龙身为柄,壶形保留了南北朝时期莲花尊的形状,又吸取了波斯金银器中鸟首壶的造型特征。壶口呈三角形,长颈,溜肩,长圆腹,下呈喇叭形高足。壶盖塑成凤首形,刻划有目、鼻、羽毛。盖面以刻划的折线、弧线以及小圆圈来表现羽毛,与捏压成三角形的壶口相吻合,盖下衔接管状舌,刚好插入壶口,倾倒时盖子不会脱落。壶身光素无纹,仅在上腹部划刻三道极浅的弦纹。胎体洁白坚硬,釉面光滑明亮,釉色白中泛青。

凤首壶原名叫“胡瓶”。唐代对中国之外的人不分国籍,统称“胡人”。来源于萨珊和粟特银器中的带把壶多为胡人使用,故称“胡瓶”。胡瓶作为传入中原的胡物,由于形状奇特,质地名贵,曾作为外民族对大唐皇帝的进献之物。《旧唐书·吐蕃列传》记载:开元十七年(729),吐蕃国的赞普向唐朝上表求和,“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谨充微国之礼。”后人称胡瓶为“带把壶”“银壶”“凤首壶”等。胡瓶在唐代盛极一时,卢纶《送张郎中还蜀歌》:“垂杨不动雨纷纷,锦帐胡瓶争送君。”顾况《李供奉弹箏婆歌》:“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在这样的背景下,定窑作为唐代著名的瓷场,必然紧跟潮流,烧制极具异域风情的凤首壶。

## 精陶定瓷娃娃凉枕

□鱼子涵

出自宋代定窑的白釉孩儿枕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孩儿枕高18.8厘米,底径长31厘米,宽13.2厘米,以孩童背部为枕面,生动塑造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伏卧于榻上的形象。男孩梳发髻,脑门宽阔,两耳如扇,眉清目秀,眼睛圆而有神,透出一股灵气;身着绣花绛罗长衫、坎肩、长裤和软底布鞋,展示了宋代服饰的特点;趴在锦垫上,两臂交叉环抱,右手持耍绣球,头侧伏在交叠的手上,两只胖脚交叠,模样调皮可爱。

定窑瓷器以白釉为代表,其精美的造型,乳白、牙白的釉色与流畅的刻花、印花、划花装饰成为宋代白瓷之魁。在宋代,人们喜欢以儿童形象来消灾降福,营造吉祥氛围,因此儿童纹样极为流行。文中孩儿枕以前、后模压制而成,采用刻花、印花等多种工艺,用刀剔刻五官、衣服,使其面部表情生动明朗,衣服花纹清晰、纹褶毕现。枕的釉色温润,充分展示出定窑不同的装饰技巧。孩童长衣下摆的朵花、背心上的球形纹以及榻座上云螭纹以模印技法呈现,后背刻缠枝牡丹,印花纹样清晰,刻花线条流畅。

瓷枕始创于隋代,盛行于唐、宋、元等各代,人们认为瓷枕可以爽身怡神,甚至有“明目益睛,至老可读书”的作用。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特别喜爱孩儿枕,在位期间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凉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乾隆还为孩儿枕咏诗11首,文中这件孩儿枕底部便镌刻其中一首:“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彼此同一梦,蝶庄且自豪。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筲劳。”

定窑始于唐,发达于五代时期,是宋代六大窑系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原属今定州市)的涧磁村、野北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定瓷逐渐衰落。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恢复,元朝又逐渐没落。20世纪70年代,沉寂了多年的定瓷复苏。

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釉(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在《归潜志》里说:“定州花瓷瓿,颜色天下白。”可见,定窑瓷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宋代诗人苏东坡在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赞美定窑瓷器的绚丽。

——编者

## 定州花瓷琢红玉

古瓷图典  
(五)



## 白瓷熏炉朱火青烟

□李喜庆

定窑瓷是我国最早的白瓷之一,在长达700余年的历史中,是中华大地上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精细白瓷窑场,被后人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1965年,在河北省定州市贡院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了上百件北宋初年定窑白瓷,均如玉石般光滑。其中,圆托五兽足熏炉是佼佼者,现收藏于定州博物馆。熏炉由盖、炉两部分组成,高24.3厘米,盖径12.8厘米,炉口径16.1厘米。盖为盆形,上有受花宝珠式炉顶,直口鼓腹宝瓶置于托盘上,顶以下似一倒置的曲腹盆,盖面上部有6个圆形烟孔交错排列。炉身呈钵形,盘口、宽沿、直壁、平底,腹饰弦纹两周,腹下有对称的5个兽面衔环足,造型稳重。熏炉瓷胎色白,细腻坚硬,釉莹润透明,略泛黄色并有垂釉痕,盖内、口沿、托底露胎,集镂雕、堆贴、刻划为一身,是北宋早期定窑瓷标准器物。

现存不少定窑白瓷刻“官”“新官”款,证明定窑白瓷曾经是官窑专供朝廷。“官”“新官”款瓷器从五代开始就已出现,一直延续到宋代。定窑白瓷有镶金口、银口或者铜口的做法,这种做法的用意有两种:一是为了表明使用者的身份尊贵或者显示豪华;二是为了弥补定窑因覆烧带来的芒口缺陷。

熏炉是中国古代用来熏香和取暖的器具。汉代刘向在《熏炉铭》中记载:“嘉此正器,巖巖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早在旧石器时期,古人就知道焚烧有香味的植物,借其烟气驱逐蚊虫或净化空气。

我国早期的熏炉以陶器为主,辽宁朝神庙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制熏炉祭器炉盖,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熏炉,距今约6000年。

## 罕见红定酱釉梅瓶

□孟丽娜

北宋定窑酱釉梅瓶收藏于江苏省金坛博物馆。梅瓶口径6.6厘米,腹径17.1厘米,底径7.5厘米,高22.7厘米。瓶口窄小,颈短肩宽,瓶身渐收,底部微微外撇,整体施酱色釉,外表泛黄色,又称为紫金釉,也称柿釉。因为釉料含铁,所以在高温中产生了类似铜器的质感。

定窑是受唐代邢窑影响较大的一个窑系,创始于唐代晚期,终烧于元代。早在唐代定窑已烧白瓷,至宋代有较大发展,除烧白釉瓷器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等品种,文献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有毛口和泪痕等特征。毛口是覆烧口部不上釉,泪痕多见于盘碗外部,因釉的厚薄不均,有的下垂形如泪迹。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诸种,风格典雅,对各地瓷窑有一定影响,曾出现不少仿烧定窑瓷器的瓷窑。

关于定窑红瓷,宋代邵伯温在《闻见录》中记载:宋仁宗执政期间,一位大臣为了讨好后宫张贵妃,送其一件定窑红瓷梅瓶,仁宗知道后,斥责张贵妃贪财好利,将红瓷梅瓶摔了。大臣将定窑红釉瓷器送给张贵妃,可见定窑红釉瓷器在宋代的名贵。定窑红瓷的釉色不是鲜红,而是酱釉。在这之前,古人说瓷器上的红色、紫色,其实都是指酱釉色。当时人们根据“人窑千变”的说法将泛红的瓷器简称为红定或紫定,泛黑的瓷器称为黑定。这件北宋定窑酱釉梅瓶就是人们说的红定、紫定。

梅瓶柔和均称的瓶体给人一种简单的弧线美,充分体现了小口梅瓶的挺拔秀丽,素雅清逸的瓷器风格是宋代瓷器崇尚简约的典型代表。

定窑酱釉瓷器之所以产量稀少,这与它的烧造难度密切相关。文中定窑酱釉梅瓶出土于江苏省金坛市一个北宋墓墓穴,墓穴的主人叫孙昭德,家中历代为官,他在宋代熙宁三年死于润州延陵县,后来又迁墓到了金坛。该梅瓶的出土曾轰动一时,因为这种定窑酱釉瓷器全世界发现的完整器也不到10件。因为烧造单色釉瓷器胎体的原料比普通白瓷要求更严格,胎体外面只挂一层很薄的釉层,却要经过上千度的高温烧制,窑变极难控制,想要达到釉色纯正、通体一致、光滑美观的效果难度相当大。因此定窑生产的酱釉瓷器主要以碗、盘、碟等小型瓷器为主,瓶、罐之类的瓷器因为太难烧造所以存世极为稀少。



## 妙绝的童子读书壶

□张宝清

童子读书壶出土于北京顺义辽代净光舍利塔基,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壶高27厘米,口径3.3厘米。壶体是一个手捧书卷的童子,五官端正,眼睛微闭,眼角略微向上挑起,仿佛正沉浸在书中的世界。他头戴莲花瓣式束冠,束发的簪子穿过发髻,发丝根根分明;身穿对襟长袍,袖口、衣褶和飘带清晰可见。衣服自然下垂,线条流畅。童子的头冠是壶口,身体中空为壶腹,所捧书卷上端的长方形孔是壶嘴,童子背后有把手。整个器物造型精巧,是北宋定窑瓷器中独具匠心的一件作品。

定窑烧造白瓷始于唐代,但当时邢窑颇负盛名,定窑白瓷精品只能与邢窑“相媲美”。到了宋代,定窑邢衰,人们便只知“定”而不知“邢”了。定窑白瓷之所以能够取代邢窑白瓷名扬天下,一方面是由于它在色调上属于暖白色,细薄润滑的釉面白中微泛黄,给人以温润恬静的美感,另一方面定窑白瓷上运用了印花、划花、划花等装饰技法,将白瓷从素白装饰推向一个新阶段。

宋代定窑烧造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北宋后期起,定窑大量采用覆烧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钵。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能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1093年,苏轼被贬为定州知州,他在涧磁村、西燕川的定窑作坊听窑主介绍定窑的历史,看了定窑烧制过程,对烧制好的精品赞不绝口,诗兴大发,写下了“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

